

· 大有党史文丛 ·

“实践导向”及其 双重意义：

1935—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HIJIAN DAOXIANG JIQI
SHUANGCHONG YIYI

1935—1942 NIAN D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吴文琰 /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实践导向”及其 双重意义：

理论——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康 著

王康 著

王康 著

王康 著

王康 著

· 大有党史文丛 ·

“实践导向”及其 双重意义：

1935—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HIJIAN DAOXIANG JIQI
SHUANGCHONG YIYI

1935—1942 NIAN D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吴文珑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逸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吴文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1-018270-4

I. ①实… II. ①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1935-1942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3201 号

“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HIJIAN DAOXIANG JIQI SHUANGCHONG YIYI 1935—1942 NIAN DE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吴文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188 千字

ISBN 978-7-01-018270-4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杨凤城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吴文珑在其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当年，我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曾仔细审读过文稿，也曾就一些问题与他讨论、商榷。论文定稿后，审阅专家和答辩专家均给予好评，并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一晃三年多过去了，期间的岁月变迁，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许多的人和事，但似乎并未改变该书作者的学术追求，他仍然念兹在兹于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术队伍日渐式微的今天，能如此坚持，多少可视为作者对其选择之精神天空的执着坚守。

这些年来，出于教学研究和工作上的需要，我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书籍并不为少。其间称得上学术之作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二是理论贡献方面的个案或专题论证，三是思想理论分析。前两类研究成果迭出，构成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流；后一类著述不多，文珑的学术选择当可归入其中，而该书稿则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时留下的宝贵印记。

该书勾勒了1935年至1942年间,中共对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理论上采取的应对;分析了中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并考察了中共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如何塑造其处理理论问题的独特方式。这样书写的好处是,能让人切身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互动过程中的内在运行理路,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我身边常有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是非常复杂的,亦是很有难度的,近代中国的曲折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有一个能否“化”成功的问题,当它成功时,历史发展便顺利向前;反之,则出现倒退,可惜,人们很少从思想史的角度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曲折性及其由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即使是专业性研究,亦不少教科书式或文件式叙述,空洞平泛、千篇一律。细想,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和探索仍任重道远。

该书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一般被学界视之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中共立足于当时的国内外现实,最广泛地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政治实践的一个时期。这十年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形态,对之后的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少有不把理论问题置于对民族国家出路的探索中来通盘考虑的。因而毛泽东和当时其他党内领导人、理论家相同的是,他们的理论认知和探索,蕴含着应对现实问题的强劲冲动,并都外化于政治实践。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有的共产党人甚至还自成一套逻辑。这些,正是该书用功之所在。作者对这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的剖析、梳理和研究,读者或会有不同看法,但应承认,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行多角度探究且颇具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宽厚的知识结构才能去深度耕犁的学术高地。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存在一个实践性问题，中共早期领导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多并非为学理而学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政治定位带来国人思想文化观念的现实性问题，“现实性”即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处理理论问题的必然特征，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共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欧风美雨的文化思潮浸染下，于是，他们在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均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传统、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与冲突问题。尽管当时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却能清晰地观察到他们身上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方面文化资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指导思想和主要理论来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尽管在这几年得到繁荣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不可能为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所完全吸收、掌握和领会，理论本身的缺陷也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增添了难以估量的困难。

因此，作者要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研究中共的理论运用情状，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微观面相，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不但需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要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有相当了解。换言之，作者需具备较强的史识和理论思辨能力。梁启超曾指出，史识就是“历史家的观察力”^①。这种“观察力”，即钱穆之所谓“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②的能力。何兆武认为，“对历史学的形成……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页。

累。”^①这种“思想和感受力”，显然也属于史识的范畴。如此这般，我们才能更好地洞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下进行的，也才能理解中共是怎样汲取传统思想资源的，这些资源为什么能在他们身上发生影响，以及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作者选择了一个需要学术勇气 and 知识积累的课题。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复杂之处，它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但正是这种繁杂呼唤着研究者真心投入，进行细致、独立而冷静的思考活动。认真看完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以有效的实践结果为目的的理论与政治的互动，确是这几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的重要特点。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文琬为他的这本书起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主题——“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这同时表明，作者对于历史上乃至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人们片面、机械化地强调理论要与现实相“结合”这一点有非常客观、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现实政治服务虽是应有之义，但“现实政治事务对理论问题的干扰，不仅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革命实践本身也鲜有帮助。一幅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图景，需要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注政治实践两者的张力关系中保持基本的平衡。而这，比之单方面倾向于理论或政治，要复杂得多”。这一论断，彰显了作者思维的敏锐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思想史研究历来是最“不讨巧”的领域，更何况，该书又着墨于既有定性和相关研究都已十分明确和丰富的延安时段，要做到既不完全与政治定性发生抵牾，又能突破研究藩篱有所创新，并不是每一位年轻学者所能轻易达至。令人欣慰的是，该书的写作，从篇章布局、史料运用、理论分析乃至基本结论看，是能够站住脚的。当然，作者在尝试打开新视角、努力引入新方法新范畴、力图别开生面的过程中，在方法与

①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对象、结论与材料的运用与诠释上难免存在青涩、僵硬处,这也许是学术创新所难以避免的吧。客观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应是一种思想史的写法,我想,这大概也是本书写得有些“形而上”的一个原因。这本书富于思辨性,文字间流露出作者特有的学术激情、一吐为快的心绪。今天读起来,我们或许会感到有些异样,觉得一些表述似可更平实一些,但以我对文珑学术旨趣的了解,改也不易。好在,学者总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个性,在学术殿堂里,如缺少了个性,想必也难深化学术。

文珑邀我为序,上面这些,权当是我对本书的一点读后感。

2016年12月19日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自序：本书为何而作

《“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 2014 年的作品，当时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问世后，在评阅者间便引起过一些波澜，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亦不乏其人。一晃三年多过去了，这本书稿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我原想将之封存留待己用，可近来还是不断有好友记得它，特别是我所在单位还同意通过创新工程项目全额资助印行它，这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实已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内的正式提出和展开讨论还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今天，经过数十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完全学术意义上的系统的、独立的研究虽刚刚起步，但仍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这就是比较科学地规范和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根据，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经验，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创立者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地位及贡献，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错误思想等。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前提、奠定了

基础,具有可观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既然相关研究已很丰富,我为何还要写作此书呢?历史学家沃尔什曾说:“历史探索并不是靠单纯的好奇心来维持的,这里还有另一个动机便是,有必要以一种既对过去的时代也对我们自己当代做出评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眼光去发现过去的时代像是什么样子。”^①十年前的大学时代,我经历过由自然科学转涉人文社会科学的迂回曲折,从而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付出了代价,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思考,起源于自己大学时代对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历史感。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期间,思想文化竞相绽放,理论探讨如同罗马角斗士进入斗兽场,公开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新思想、新观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得到众人响应,即使思想争辩毫无结果,人们仍能从过程本身得到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然而 80 年代结束之后,时事转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日趋功利化的大环境下,“文化热”竟似明日黄花、悄无声影。学界转而流行钻故纸堆,避谈政治思想,部分学人甚至还提倡“乾嘉学术”,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与之相应,陈寅恪、王国维等常被人引为谈资,而对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研究和探讨却渐渐淡出学人视野。总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后学界的典型特征。

应该说,中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具有专门知识的学问家,如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各门类学问家的出现,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时代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砥砺和时代的前进不需要思想家。所谓“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等说法,我向来都不

^① [英]W.H.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8 页。

赞成。这一点，在党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目前，学术界的这一概况改观了吗？没有，甚至可以说，在思想和学问两方面似乎都是如此。尽管少数学者在部分非常专业的领域，写出了一些好作品，但它们常常只能被淹没在文化垃圾中。在多数场合，思想探索难以成为一种公共活动，思想者必须习惯于做孤独的斗士，这是他能对社会挑战所做出的仅有回应。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却是，中国如今在很多方面已再次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问题情景之中。只是，我们似乎已没有“胸怀世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也难有批判锋芒、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难以抑制的反叛意识了。

如今社会正面临急剧转型，现实中各类问题纷繁复杂，这当然会反映在思想理论上。可惜，在现实问题面前，人们虽多方寻求解决之道，但能够明确提出问题，且有像样理论阐释的却不多。^①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或政策，多是以功利主义标准而非以理论本身的权威性来衡量的。我在与中央党校学员交流的过程中就发现，相对于抽象的理论阐述，他们明显对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策略更感兴趣，即使这些方针和策略不一定具备理论支撑。更有意思的是，对于部分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时髦，而且成为一种“怪异”的象征，以至有时我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时，竟不得不在其旁放上一本党史方面的“权威”书目，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时，就用“权威的”盖住“怪异的”，以掩人耳目。作为一个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深深地陷入

① 钱理群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他最高的理想是创造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和批判性的理论，这和做“精神界的战士”，有着内在的一致，或者说“精神界战士”有两类：一类是对现实做出批判性发言，影响社会，为解决社会问题直接发挥作用；另一类是依然保持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但又要和现实拉开距离，静下心来，在更开阔的视域里做更深入的、更根本的、超越性的批判性思考，进行学术与理论体系的创造，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想、批判资源。但是，这样有理论创造自觉的思想者，在当下中国是缺失的。参见钱理群：《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附录部分。

了思想的困惑和价值的迷茫之中。在现实的冲击下,一种把当代中国命运和历史际遇联系起来思考的意识日益强烈。于是,我决定倒转时光,将思维折回 70 年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内正式提出并被广泛运用的延安时代。

《“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就是在上述源自大学时代的历史意识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

本书论述的是 1935 年至 1942 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面相,认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实践导向”特色,它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不过,细心的读者必定不难体会到,本书着重强调的是其消极面。正因为此,我担心这一研究会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它否定了这一时期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过度突出了消极面,难免有哗众取宠、博人眼球之嫌。但是,正如学者莫里逊所告诫的,历史学家应该“指出每一种胜利的事业都有某些恶的因素,每一种失败的事业也总有某种善的内核,从而使该时代的偏激得到平息”^①。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历史叙述亦当形形色色、千姿百态。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存在一个被选择和吸收的过程,早期的共产党人常常根据现实需要“则其要者而取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性格”自建党以来就普遍存在着。而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表明,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仍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张力关系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如何合适地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马克思

① [美]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载何新等译:《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3 页。对此,卡尔·曼海姆也说,历史进程本身有一个固定特点,限制一个观点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往往会在和相反的观点的冲撞中得到纠正。试图摆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任务,是去理解每一个别观点的狭隘性,理解在整个社会过程中这些相互有别的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80—81 页。

主义中国化的成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的是一种带有明显“实践优先性”特征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者若仅虚谈学理，不解决现实问题，有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要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过度功利化、政治化，也必然背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导致理论的异化，限制其长远指导作用的发挥。今天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反省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本书草创完成时，我在打印本扉页写了一句献词：“思想者应该明确的责任就是，面对当时盛行的各种思想，哪怕是最权威的思想，都要在个人能力的意义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必要时还要‘反潮流’。”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如今，我仍对这句献词深以为意。现在，我想引用更能传达心绪情结的学术语言对此略作补充：

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上，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①

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找真理吧，因为真理中有幸福；无论真理是什么，它都比所有不是真理的东西要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在随便什么结果之前让步。^②

写书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期得了令人心身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为某种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所驱使，也许我永远不会做起这样一件事。尽管本书最终可能既未原本地复原历史，亦未对我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意愿作出清晰呈现。但正如学者费伏尔在他人生的最后 10 年里所说的那样，历

① 田如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4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19 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453 页。

史学既是过去的科学,也是未来的科学。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寄望于未来……

吴文琰

2016 年 12 月 6 日夜

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与内在逻辑	1
第一节 研究思路、命题与创新点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6
第三节 学术检视：方法论问题	19
第二章 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与落幕	23
第一节 运动何以兴起	23
一、“五四”后的文化与政治	24
二、“反革命”文化：国民党和日本	27
三、民族危机、文化统一战线与“新哲学”	32
第二节 救亡式启蒙：新启蒙运动的内在限制	37
一、陈伯达的最初呐喊	38
二、运动的自由、理性内涵	42
三、“文化作为政治的尾巴”	48
第三节 “五四”记忆与中共意识形态建构	56
一、“五四”的资产阶级性	57
二、“五四”理论武器的贫乏	62

三、“五四”的大众化论述	65
四、小结:理论与政治的关系	70
第四节 余论:革命导向与启蒙任务的冲突	72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蕴再诠释	75
第一节 “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历史背景的分析	75
一、命题的“前驱先路”	76
二、时代氛围和时代思潮	80
三、党内“本身的内在活动”	84
第二节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义特征	89
一、内涵的模糊性和抽象性	90
二、“实践导向”和功利主义	93
三、传统认知的感性和晦涩	96
四、小结:一个“有经有权”的概念	100
第三节 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02
一、再论“中国的特殊性”	103
二、“国营实业”及其合理性	109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118
四、小结:“洞见”中的“不见”	124
第四节 余论:理论困境的反思与超越	125
 第四章 学习运动中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127
第一节 历史环境的“透视”	127
一、党员干部的理论缺失	128
二、社会需要的历史层面分析	132
三、政治文化生态图景概观	135
第二节 道德遗产的认识和学习	140